

导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 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

一、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模式研究的基本问题

80年代末至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处在从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之中。从这一大背景下观察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中国经济改革就具有了国际比较的意义。迄今为止，中国的改革已走过了 20 年的历程，并在各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展。具体标志有二：一是改革促进了发展。在改革时期，中国的 GDP 增长率，平均每年为 9.8% 是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的三倍（见表 0-1）。二是在实现改革的目标，即实现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道路上，已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据测算，目前中国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市场经济调节作用的力量整体上已达到 65% 左右。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个方面的进展和变化是在政局稳定和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实现的，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相比较，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国际上普遍承认的成功经验（见图 0-1）；由此在理论上形成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模式”这一概念。

从国际范围来看，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在实践中存在着两种方式：一种是渐进式，即通过改革的逐步推进，用市场机制代替计划机制，从而实行运行方式的逐步转换；另一种是激进式，即通过出台“一揽子”实施的措施，以放开市场价格和实行私有制为主要内容，在短期内切换运行机制，实行运行方式的快速转换。在实践中，中国的改革选择了前一种方

表 0-1 中国 GNP 与 GDP 的增长

指 标	总量指标 (元)					平均增长速度指标 (%)			
	1978	1985	1990	1995	1997	“六五” 时期	“七五” 时期	“八五” 时期	1979~ 1997
国民生产 总值	3264	8989	18598	57495		10.8	7.9	11.6	
国内生产 总值	3624	8964	18548	58478	74772	10.7	7.9	12.0	9.8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19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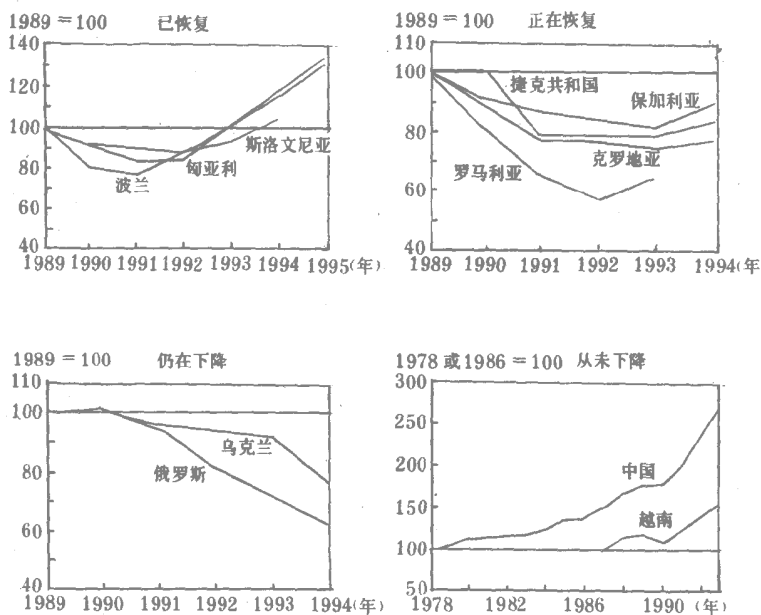


图 0-1 部分转轨国家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资料来源: 1996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第 20 页。

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两种方式孰优孰劣目前还在争论之中，但绩效不同则是肯定的。以此为主要内容的“过渡经济学”正在国际上迅速发展。^①

90年代以来，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在把注意力集中到对东欧和前苏联国家的体制转轨，但又发现“激进战略”的实施效果并不理想之后，又把视野转到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上来。他们认为，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情况相比较，中国改革既有自己的特色，又有被国际上普遍承认的经验。这些经验主要是：按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改革，形成了渐进式改革模式；创造了中短期的以双轨价格为主要代表的双轨经济体制；改革与对外开放紧密联系，相互促进；注意利益关系的调整，保证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使储蓄率长期保持在较高水平，促进了经济的稳定增长等等。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认为，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已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成功转轨的“样板”。^②当然，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在肯定中国改革成功的基础上，对中国的改革战略是否具有国际普遍意义在认识上是有分歧的。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不是由于“渐进战略”的采用，也不是它的先试验再推广的模式，而是由于中国在改革初期面临的“初始条件”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改革的“初始条件”包括巨大的农村劳动力资源，较少的国家补贴人口（仅存在于城市中的全民企业）以及相对来说较分散的经济体制（相对于前苏联、东欧国家）。这一切都对中国的渐进改革的成功提供了现实基础。这些因素由于是特殊的，是中国特有的，因此，这就决定了中国的改革不能被其他国家所仿

^① Lavigne, Marie (1995). *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t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London: Macmillan.

^② Perkins, Dwight H., (1992). *China's Gradual Approach to Market Reforms*, paper presented at a conference on Comparative Experiences of Economics Reform and Post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July 6-8, 1992, el Escorial, Spain.

效，中国经验因此也就没有普遍意义。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由于改革时面临的“初始条件”与中国不同，不可能走与中国相同的道路，而必须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选择“激进”战略。^①与此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改革完全是脱离西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经典理论的，中国改革及其推动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事实，形成了所谓“中国之谜”。对这一谜底的破译，已成为国际经济学家的一个“热门”工作。这些都构成了以中国为案例，探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规律和以过渡措施为主要内容的“过渡经济学”研究正在国际上迅速兴起和发展的背景。

在中国国内，大部分经济学家充分肯定了中国渐进改革战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系列配套改革措施，^②使改革推进至1992年中共十四大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和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近年来，也有一些经济学家对中国的渐进式改革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们认为，中国渐进式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激进式改革的根本性差异在于，中国渐进改革的实质是一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即在改革前期，对旧体制因改革阻力过大而“改不动”的同时，先在旧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的体制（如各种形式的非国有经济、市场定价机制和对外开放所需的市场环境），并在旧体制较薄弱的领域先行突破（如农村改革）。在这部分体制逐渐生成，并不断压迫旧体制的情况下，改革才直逼原体制的核心部分——国有企业改革和宏观调控体系改革。^③

^① Sachs, Jeffrey D, and Woo, Wing Thy (1993). 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s of China,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conomic Policy Panel Meeting in Brussels, Belgium, October 22-23, 1993.

^② 中国改革课题组编：《中国改革大思路》，沈阳出版社，1987。

^③ 樊纲“渐进与激进 制度变革的若干理论问题”，《经济学动态》1994年第9期。

这种“增量改革”或“体制外改革”在改革前期表现为一种“外围战”，先扫清“外围”，再直逼“核心”。这种战略的好处是，由于国有经济部分在前期仍在维持运转，可以保持经济增长和社会稳定。但这种战略长期延续会带来双轨体制并存所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如经济波动、通货膨胀、腐败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平加剧等问题。^①对改革本身来说，把最难改的旧体制核心部分放在最后也存在着由于这部分的改革难度最大，而最后导致整个改革不成功的危险。因此，在改革中期，还很难对“渐进战略”和“激进战略”作出谁优谁劣的最后评判。^②此外，还有人从另一角度分析中国改革经验的适用性。他们认为，中国的传统计划体制源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所采用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因此，中国的改革经验对那些采取类似发展战略的国家具有普遍意义。^③后来，又有经济学家通过微观经济分析，证明了价格双轨制对维持改革初期国有工业增长的作用，从而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中产出急剧下降的情况形成了对比。^④这些理论成果构成了对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模式进行进一步分析的主要思想材料。

当然，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实践中。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使改革在一些重大方面取得新的突破。中国渐进式改革由于已经设立了在本世纪末基本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表，一系列改革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亟待

① 吴敬琏，“中国采取‘渐进改革’战略吗”，《经济学动态》1994 年第 9 期。

② Fan Gang (1994). Incremental Changes and Dual-track Transition: Understanding the Case of China, *Economic Policy*, December 1994, Great Britain

③ Justin Yifu Lin, Fang Cai and Zhou Li (1995). Why China's Economic Reforms Have Been Successful: Implications for Other Reforming Economies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论文(英文版), No. E1995002.

④ 张军著：《“双轨制”经济学：中国的经济改革（1978-199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近几年内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以通过改革来解决制约发展的主要体制障碍，从而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两个根本转变，为进入新世纪的经济发展创造条件。因此，必须进一步汲取和借鉴国际上发达国家实行市场经济的经验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的经验和教训，重点解决中国完成全面改革的一些突出问题，如国有企业改革、金融体制改革、要素市场发育和宏观调控体系与政策体系完善等。这样，中国的改革就有必要择取国际上适合需要的理论。中国的改革理论就有了在借鉴国际经验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与分析的现实推动力。

概括起来，对中国市场经济过渡模式进行新一轮研究的基本问题有三个：(1) 中国的改革模式采用渐进战略是由什么决定的？(2) 中国的渐进改革道路的条件是如何形成的？(3) 借鉴国际经验，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应该如何进一步推进？本书围绕这三个内容，从一个特定的视角，观察和分析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模式形成的原因和条件。

二、目标制约道路：中国渐进式市场经济改革模式形成的基本原因

要回答以上三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改变一下分析视角。如果说国际上部分经济学家是从“初始条件”即改革起点出发，来比较分析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异同的话，那么他们理论分析的隐含前提是，中国与前苏联和东欧等国改革的归宿或终点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如果我们从“改革目标”即改革终点这一角度反思中国改革的道路，就有可能从更深的层次揭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模式的本质、特色和实质，从而能够更好地从理论上说明中国经验的适用性和中国借鉴其他国家改革经验的必要性等问题。

国外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一个典型的进行改革的经济必须在六大领域作出重大变革，即宏观经济稳定化、价格自由化与市场改革、企业改革、贸易自由化与货币自由兑换、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创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与制度框架。^①

无庸讳言，这就是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市场经济改革的主要领域（尽管在个别领域的程度上有区别）。同时，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心目中，这六大变革是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实行私有化也成为一些国家进行改革的一个必要条件。由于这一推行私有化的基本特征，也就构成了理论上所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把这一体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经济改革目标的话，那么改革理论分析所作的工作，就仅会局限在探讨目标一致条件下的改革路径选择及其优劣比较问题上。这里当然要考虑各国的“初始条件”，而且这种“初始条件”往往又是决定改革路径的重要变量。在这种框架下分析改革道路，就像攀登珠峰是选择北坡还是南坡那样，是属于具体路线制定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改革就基本可以归为这一类。尽管近年来在实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过程中，俄罗斯等国也出现了“回渡”等问题，但无论是东欧国家“回到欧洲去”的口号，还是前苏联国家 90 年代以来的改革措施，都清楚地说明这些国家改革的终点何在。^②

与之相比较，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恰恰在目标上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不同。尽管中国是在实质上进行改革十余年后，到 1992 年才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改革目标，但是在此之前各个阶段的改革目标设计和实际取向，都体现了在社

[美] 斯坦利·费舍尔，“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前三年的经验教训”，原载《美国经济评论》1993 年 5 月号，中译文载《经济社会比较体制》1994 年第 3 期。

②（根本经济改革的圆桌会议的材料）（俄）《经济问题》1995 年第 4 期。

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基础上运用市场机制，发挥市场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基础性调节作用，建立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意图。尽管这中间也有反复，但这一主线从来没有改变。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以及“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和“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直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最后确立，只不过反映了人们对这一改革目标不同程度的认识过程。这一点在邓小平提出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命题中得到了更高层次的概括和反映。因此，中国经济改革的实质可以归结为，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用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从而达到发展生产力，完善社会主义的目的。显然，这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推倒重来”的做法有巨大差异。因此，中国改革与前苏联和东欧国家改革最大的区别在于改革目标的异同。

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选择何种具体方式，虽然涉及到各个国家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民族等特点，不能一概而论，但从改革目标的特定性（即不是一般泛泛而谈的市场经济，而是特定的市场经济类型）出发，由改革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关系以及改革的具体内容来说，在改革方式的选择上大体上还有它本身的一般规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²⁰年来已呈现两个重要特点：一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经济运行方式的转换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二是改革的方向是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不断扩大和加强市场机制作用的范围和力度，使市场逐步在社会主义经济中“到位”，最终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于两个特点的制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只能选择渐进式的道路。

首先，改革目标对改革道路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改革

也是一场革命，但在基本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改革与进行制度根本性变迁的改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前者必然要考虑改革的进展，要以保持制度的基本内容为重要条件，要以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作为市场经济改革的社会政治基础和依托。没有这个依托，或者抛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就会走样。在这种基本规定制约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必然在实践中选择“渐进式”的道路。这具体来看有两个原因：第一，要实现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和达到共同富裕的本质规定，需要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实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作条件。而这两个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特征，在脱离开原有的计划经济载体之后，如何寻找到它们在市场经济中的有效实现形式，需要较长时间的摸索。改革实践也证明，实现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并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调节经济运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地区之间的共同富裕目标，恰恰是目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难点和重点所在。从改革具体措施来看，由于中国改革是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自我调整和自我完善的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在具体改革中必须承认和消化过去传统经济体制留下的问题，以保持基本制度内容的连续性。这在国有企业改革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如职工就业、住房、退休保险、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内容，在新的体制下必须有新的方法得以承认和解决；企业的历史债务、社会负担等问题也须在改革中采取妥善手段予以解决。这样，这种探寻和试验就比那种一夜之间实行私有化和由市场自动决定收入分配的做法困难得多，表现在时间上就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这是构成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选择的一个经济制度原因。第二，经济改革在实践中走渐进式的道路，就能够给社会主义上层建筑适应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进行调整，并进行社会的全面整合留出一定的时间余地，防止或减少由于急剧改革而对社会带来的剧烈震

荡，保持社会结构和政治层面的相对稳定。这既是维持基本制度运转的要求，又是保证改革成功的条件。这就构成了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选择的政治制度原因。因此，改革渐进式道路的选择主要是由改革目标规定的改革性质决定的。

其次，改革渐进式道路的选择也与改革的具体内容有关。实践已经证明，建立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可以比较迅速，而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却需要很长时间。如果说，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可以通过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手段，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中国大陆用了 7 年）自上而下建立起一套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话，那么，市场体制的形成和完善，从机制形成的技术要求和配套条件上，则要比建立计划经济体制需要更长的时间。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长期排斥市场作用的历史条件下，市场机制的形成并综合发挥整体调节作用，要比计划体制的建立和总体发挥调节作用困难得多。这具体表现在：（1）市场机制的作用，要由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充分发育为条件，而市场体系的完善和市场的发育过程与人为建立计划体制不同，它是一个社会历史的自然过程，特别是在长期排斥市场作用的基础上重建市场机制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2）在市场经济的改革中，国家的宏观调控方式要适应市场机制作用的特点进行改革，从过去的直接调控转为间接调控，这就需要改革原有的宏观调控体系，调整调控的对象，探索一套以市场机制作用为基础的宏观调控方法。显然，这比在社会主义经济建立初期建立一整套计划体制困难得多，也需要一段长时间的探索。（3）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企业作为市场主体对市场信号做出积极反应，要以本身的经营机制转换和组织结构改革为条件。这种机制转换和组织结构改革是在原有的企业机制和体制基础上进行的，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这些因素都决定了市场经济改革这种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与社会主

义国家建立时的由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快速过渡不同，需要走渐进式的改革道路。

以上两点，一个是中国改革的特殊性，另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普遍性。它们既制约着中国改革模式的选择，又提供了对各国改革进行国际比较的基础。因此，从由改革目标所决定的改革的具体要求和历史过程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选择渐进方式有其客观必然性。

三、创造渐进式改革的条件：80年代起步的案例

以目标选择道路，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渐进方式有其必要性，但要实现这一方式，仍然需要有一系列的条件配合。世界银行认为，实行渐进式改革战略的前提是，“要从第一步的部分改革中获得重大的劳动生产率收益。这样，它们就会相应地提高人们的收入，进而为今后在自我强化的进程中更加难以进行的改革提高动力。而国家必须有能力在较长的时期中持续不断地进行改革，并同时有选择地限制开放经济所带来的消极影响”。^① 因此，只有“对其初期的改革会产生积极作用这一点比较有把握，对它们有能力控制处于部分开放状态中的经济比较有把握的国家，才能探索分阶段的改革。”^② 从这一点探讨中国是如何成功实施了这种分阶段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看来需要对改革阶段产生收益这一条件的满足作重点分析。

从中国改革 20 年的历程来看，在 80 年代，有三个方面的具体改革，创造了较明显的改革收益，它们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

^① 《从计划到市场》第 10 页。

^② 《从计划到市场》第 11 页。

制、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与价格双轨制以及沿海地区的开放。正是由于这些改革举措，启动了中国的改革之路，保证了渐进式改革的实现条件，而这三条主要措施，都源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因此可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策，不仅使中国走上了改革的不归之路，而且使中国改革走上了成功之路。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是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1978年12月开始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纠正经济工作中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端正了指导思想，从而为我国的改革创造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邓小平同志就指出，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目标，“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①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地大胆下放，否则不利于充分发挥国家、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四方面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实现现代化的经济管理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应该让地方和企业、生产队有更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②我们的经济管理工作，“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在全国的统一方案拿出来之前，可以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地区、一个行业做起，逐步推开。”^③这些讲话实际上已经提出了中国改革的目的、动力和道路问题，这也构成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 135 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 145 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第 150 页。

旨。同年 12 月 18 日至 22 日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肯定了邓小平同志的这些思想，在决定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同时，指出要对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管理方法进行认真改革。改革的方法是针对权力过于集中的缺点，有领导地大胆下放权力，让地方和工农业企业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有更多的经济管理自主权。强调应该坚决实行按价值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从此，中国揭开了渐进式改革的序幕。

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等两个文件进行讨论和试行，提出了加快农业发展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和经济措施。在决定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同时，实际上也提出了对农业生产体制进行改革的任务。随着党的一系列农村经济改革政策的贯彻，按照农民的强烈愿望，各地农村普遍建立了不同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到 1981 年底，全国已有 98.7% 的生产队实行“联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其中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占 74%。至 1982 年全国农村基本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由于农业生产体制的改变，加强了农民的责任心，提高了生产效率。80 年代前四年农作物大幅度增产，粮食产量于 1984 年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农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农村市场相应扩大，为工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2. 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工业企业扩大自主权的改革在 80 年代初期迅速展开。四川省在 1979 年扩大了企业扩大自主权试点的范围，从 1978 年 6 家企业增至 1979 年上半年的 100 家。至上半年，这 100 个企业的工业产值比全省工业总产值的平均产值的平均增长水平高 56.7%，利润增长幅度也较大。^①根据四川省的经验，全国于 1979 年 5 月在北京、天津、上海选

^① 新华社 1979 年 7 月 13 日报道。

择了 8 个企业进行试点。为了规范这些试点，国务院于 1979 年 7 月发布了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济管理自主权，实行利润留成，开征固定资产税，提高折旧率和改进折旧使用办法，实行流动资金信贷等 5 个文件，并要求地方、部门选点试行。至 1979 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 4200 个，1980 年进而又发展到 6600 个。这样，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改革就逐步推开。与此同时，实行了新的“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部分商品实行市场调节，开展了市场竞争，恢复了城乡集市贸易。

在上述改革政策中，有两点对以后的改革进程发挥了重要的、关键性作用。一是企业在扩权中获得产品自销权，自销产品的范围不断扩大，二是由于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市场竞争形成了市场价格。但是，由于计划配给的体制仍然存在，自销产品主要限于超计划生产的产品，在计划产品按计划体系封闭流通的同时，自销产品的价格必然高于计划价格，这样，就逐步形成同一产品计划与市场价格并存的局面，为后来的价格双轨制在生产领域的运行创造了条件。而生产领域价格双轨制的推广，推动了企业在完成计划任务的同时，扩大了计划外的生产。企业自销产品和市场采购原材料比重由此而不断扩大。这样，一方面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产出，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市场生成和发育的空间，为非公有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正是由于这样的微观企业对改革政策的反应以及农业的发展支撑，80 年代初期，国有工业部门保持了可观的经济增长率，并在全国工业产出中保持 65%~70% 的产出比重。这种速度效益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也促使国家财政收入的逐年稳定上升，从而创造了继续改革的经济基础，避免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改革中产出急剧下降的局面。

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出发，也

提出了对外开放的任务。1979 年，中央首先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对外开放。1980 年，又批准了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四个经济特区，并且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欢迎外国投资者到我国投资。1984 年，又扩大开放范围，开放了 14 个沿海城市，并设立了 11 个经济技术开发区，吸引外商投资。1985 年，又决定开放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区。以后又实行了全方位的开放战略。这样，在改革的同时实行开放，使中国原来相对封闭的国民经济系统转变为一个开放系统，增加了资金、人员、商品的进出和流动，既扩大了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又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投入，从而为经济外向型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为经济改革提供了外部促进因素。到 1985 年，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由 1978 年的 9.9% 提高至 24.2%，实际利用外资达到 400 亿美元。开放对经济发展的促进因素，与这一时期工农业体制改革的成效互相作用，使我国经济在 80 年代上半期的发展明显快于改革之前，综合国力明显增强，从而为以后一个阶段的改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对此，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〇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至一九八八年。”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① 这期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做大了蛋糕，既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也为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和改革成本的置换提供了条件。中国 90 年代的全面配套改革正是建立在 80 年代改革取得良好收益

①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 376 页。

的基础之上的。

四、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

综上所述，可以提出一个概括性的论断：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实质，是要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础上，完成经济运行机制用市场机制对计划机制的置换任务。这一实质规定了改革目标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这一目标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的市场改革渐进方式的选择。这一渐进方式由两个要素决定：一是由市场机制置换计划机制本身的困难和复杂性决定；另一个是由在社会经济基本性质不变的基础上进行这种置换的制度要求和约束条件决定。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中国渐进式改革的道路，而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中国通过 80 年代三个方面的改革，又创造了渐进式形成的条件，从而在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基础上，为中国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奠定了基础。

回顾历史经验、进行国际比较，必须立足于进一步推进中国的改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改革举措，在理论上的集中体现就是二十年来在改革的实践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因此，我们要实现经济体制改革的新突破，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面对世纪之交的新情况、新问题，今后的改革开放在战略上必须注意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确定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邓小平经济理论最核心的内容，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也是中国改革二十年的最主要的成果。在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进程中，我们经过了二十年的艰苦探索，特别是党的十四

大以来的五年的努力奋斗，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提高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能力和市场经济运行的驾驭能力。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前最主要的是要突破国有企业改革这一关，不然就会前功尽弃，因此必须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在今后三年内坚定不移地完成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的综合配套改革，实现本世纪末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目标。

其次，要坚持“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今后改革的进程中还将出现很多新情况、新问题，需要有新的思路、新的措施。但是不论怎样变化，应有应对之策，这就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基础上，坚持以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作为检验改革成败得失的标准。过去的二十年，正是坚持“三个有利于”这个标准，才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效，今后的改革开放欲要实现目标，更要坚持“三个有利于”标准不动摇。

最后，要注意世界潮流的新变化。中国的改革与开放是互相依存的，今后这个特点将更加明显和突出。要在开放中推进改革，不能不注意世界潮流的发展和变化。今后，中国改革开放要最终实现目标，也必须注意世纪之交世界潮流特别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变化。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既大大加速了国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也带来了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这样的经济多米诺骨牌效应。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趋势已使知识经济从过去的想像变为现实，使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及产业结构理论黯然失色。显然，现在中国改革的国际环境和开放条件已大大地不同于 80 年代的改革初期，也不同于 90 年代的改革中期。注意世界潮流的这些变化趋势，提出改革开放的应对之策，就必然成为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新的探索领域，必须予以足够重视。